

片。这些东西,我都没有看到。但是,作为一个爱书人,能亲手触摸一下心仪已久的宋版书,感受一下书的气息,真的很幸福。万没想到,这样的幸福,是在日本的东京获得的,无论如何都算奇遇了。来东洋文库博物馆参观的东京市民倒也不少,但进图书馆查阅中国古书的人,的确罕见。也许正因为如此,这里的宋版书,才没有像北图那样,受到特别的保护,非有特别的关系,根本碰不到。

在书海中游走的时候,碰巧碰到了一群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。一个日本老师在跟他们介绍这些藏书,听到我说中文,就走过来,要我去跟这些学生讲讲。当然,讲中国的古籍,也许我比他更合适一点。这些中国学生,在国内的时候,从来没有接触过线装书,他们还以为国内这样的书根本就没有了。我告诉他们,他们所在的大学,都有这样的书,只是他们看不到,都收藏在善本书库里。我说,等你们混成了教师,就有资格去调阅了。

文库里对我最有价值的,是成套的《北华捷报》和《顺天时报》。只是,看这些文献,需要大块的时间。临走的时候,陪同我的日本朋友给我看了一些水墨画。画者肯定是西洋人,题材有马戛尔尼谒见乾隆。画面上,乾隆老儿抽着长长的烟袋锅,不以为然地喷着黄烟。马戛尔尼单腿跪着,地上摊了一地的西洋礼物,从望远镜到网球拍。手上呈上一封信,估计是英国国王的信,但却没有人接。整个场景,像漫画似的。中国人的

服饰,一点都不靠谱,满人的大帽子,被画得像英国士兵的头盔,乾隆旁边居然还有一个武士,手里拿着把大刀。另一些画,画的是鸦片战争的场景,中国的战船上面有帆,下面却伸出一排的桨。英国的军舰,有明轮,但火炮却摆在甲板上。当然,接下来这样的中国战船一个接一个地被打沉,硝烟骤起,火光四射。然后是英国兵打着旗帜,乘着小船登陆了。中国水师的船画得不对头,英国军舰也不是那么回事,但战况还就是这样。画上的日期是1849年,估计画家是根据当事人的事后描述画的,自己根本就没来过中国。这些画,跟当年马戛尔尼使团随行的画师的画作比起来,简直差得太远。只是,作画的时候,第二次鸦片战争,都快要开打了。如果这画师有兴致,真的跟着英法联军来中国走一遭,可画的东西就太多了。

东洋文库里的藏书,到了今天已经不尽是莫里循的收藏了。我们进去的时候,还看到成箱子的新书,堆在走廊里,等着登记造册上架。但不可否认,莫里循的收藏,还是这个文库的主体。当年莫里循将书卖给日本,曾经惹得好些中国人很是不高兴。其实,在1917年的时候,中国刚刚经过张勋复辟,政局的动荡,使得中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放这些藏品。莫里循对中国是太了解了,知道这些东西如果落到中国政府手里,会有何种的命运。所以,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,这批藏书在日本,其实还是合适的。

日本的品梅记

张 鸣

品梅,是喜欢梅兰芳的“梅党”们的雅事。在梅兰芳先生生前,文化人和媒体人,品梅是一种持续的爱好。梅兰芳是一代名伶,但如果他这辈子没有碰上齐如山,也许他的“名”,会跟那个时代众多京剧演员一样,仅仅是中国有幸能看到梅剧的人们中间享有。但是,齐如山这个出身同文馆,懂外文而且懂京剧的能人,跟他的同好一道,将梅兰芳推向了世界。梅兰芳访美,是尽人皆知的事,访美引起的轰动,也是至今梨园行乐道的盛事。但是,在1929年访美之前,梅兰芳第一次走出去,其实去的是日本。

前后一共两次,第一次是1919年春天,一次是1924年秋天。梅兰芳的两次访日演出,都得到了极大的成功。一个喜欢京剧的日本朋友跟我说,电影《梅兰芳》里那个日本军官非常喜欢梅兰芳,但电影却没有交代他是在哪里看的梅剧。其实,自打梅兰芳来了之后,日本也有了很很多死忠的梅党。

跟日本朋友谈起梅兰芳,缘于一场歌舞伎的演出。在日本期间,一位日本朋友嫌我的行程过于单调,特意买了票,请我去看了一场歌舞伎的演出。歌舞伎的名字叫做“浮世柄比翼稻妻”,据说是

江户时代的名篇,看名字,中国人无论如何都看不出名堂来,其实写的是一些上层武士家族的争斗和爱情故事。演出长达四个小时,尽管日本朋友事先把故事译出来,中间还加以讲解,但依旧看得我一头雾水。印象最深的,是歌舞伎跟京剧一样,有脸谱,好人坏人,看人物的脸,就一目了然。白脸是好人,红或者花脸,就是坏人(跟京剧大不一样)。所有的角色,无分男女都是男人演,所以有男旦。而且动作比较夸张,多少有点舞蹈的意思。但跟京剧不同的地方也多,比如背景和话剧类似,是实景,不像京剧不过是意思意思,抽象得一塌糊涂。如果演出时需要一只飞鸟,就上来一个人拿一根棍子,举着一只假鸟在台上翻飞。上下场不光走场上的门,而且从观众席上穿越,一边走,还一边表演。最大的不同,是歌舞伎的演员在台上只说不唱,只是后台时有伴唱和音乐。歌舞伎跟中国戏剧舞乐的关系,应该比京剧要早得多,更接近早期的参军戏和踏谣娘。

但是,日本的歌舞伎毕竟跟中国戏剧有些渊源,正是这种渊源,让日本人在欣赏梅剧的时候,有了某种亲和感。梅兰芳访美,美国的观众虽然热情,甚至追着梅兰芳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走,但老美们看的还是热闹,而且是经过一些精通西方文化的文化人刻意改造过的热闹。这里面,除了梅兰芳个人的魅力,人们看的,还是来自东方的新奇。显然,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文化人不是这样。第一次访日,梅兰芳是跟日本的歌舞伎同台献技的,一场歌舞伎片段,一场梅剧片段。让观众们看得非常过瘾。一批日本著名作家,像芥川龙之介、谷崎润一郎、永井荷风、秋田雨雀、菊池宽、久米正雄等人都来捧场,作文,写诗记事。十三个最著名的汉学家内藤湖南、青木正儿、神田喜一郎等人出来写剧评。这些人的捧场,说的不尽是外行话。这些剧评和作品,后来合编为一本日本的《品梅记》,原版收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戏剧博物馆里,这个博物馆,还收藏了当年梅兰芳在日本演霸王别姬的戏装。不仅如此,日本画家邬

木清方现场作画,雕刻家朝仓文夫创作了梅兰芳的半身铜像。日本朋友告诉我,当时,整个日本的文化界都为之癫狂,从来没有一个外国演员得到过如此的轰动,梅兰芳是第一个日本人按照中文发音称呼的中国人。

第二次梅兰芳访日,是在五年后,日本关东大地震之后。大地震发生后,中国的京剧名流梅兰芳、尚小云、杨小楼、马连良等人举行义演,将得到的钱都捐给了日本。这种时候,梅兰芳的到来,更是令日本人兴奋,也由此奠定了梅兰芳在日本的地位。电影《梅兰芳》里日本军人对梅兰芳的威逼,多少有点言过其实。其实,就凭梅兰芳在日本的名声,在当时的沦陷区,日本人不大可能对梅兰芳太过分。

抗战期间,梅兰芳蓄须明志,不肯演戏,的确是件值得称道的事情。但到底是否完全基于抗日情绪,我其实有点疑惑。纵观梅兰芳先生的一生,他似乎不像是个具有很明确的政治立场的人。第一次访日演出期间,正好国内爆发五四运动,目标就是日本。但梅兰芳先生根本没受到任何影响,该怎么演,还是怎么演,更没有在演出剧目中添加一出抵御外侮的戏,比如杨门女将之类。抗议日本人的侵略。梅兰芳罢演,跟战争爆发,经济低迷,捧场的金主们的离开,继续唱戏已经无法维持不了偌大戏班子的生计,也许有点关系。既然维持不了这样一个大摊子,也就只好歇了。如果真的像电影演的那样,连生命都受到了威胁,梅兰芳大可以离开上海的。当年,尽管是战争期间,不仅沪港两地来往自由,就是去大后方,也没什么问题。

尽管近代中日之间总是伴随着不快和悲剧,但两国的交往过程中,也有一些愉快的亮色。两国文化的交流,无论从哪个角度说,都是有益的。其中,梅兰芳的访日,就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毕竟,那是中国京剧走出国门的第一步。

责任编辑 孔令燕